

评

对阿拉伯世界均等论的质疑



Marcus Noland和Howard Pack

变化世界中的阿拉伯经济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2007年，350页，24.95美元（平装）

在《变化世界中的阿拉伯经济体》一书中，Marcus Noland和Howard Pack考察了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以及也门10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业绩与发展前景。考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阿拉伯主义”使得对各国经济业绩和前景的比较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同质性。作为在1976年就写过一部关于该地区的情况的著作（其涉及的国家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伊朗）的作者，我敢说，“阿拉伯”地区的同质性微乎其微。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国家1997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都没有呈现出希望中的那种同质性（很难对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加以比较）。后来在2006年，我感到波斯湾的石油输出国在同质性方面的指标可能会表现好一些，然而即使

这些国家也好不到哪去。作者所列举的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以致于很难对它们作简洁的概括，对于这一相同的结论，Noland和Pack则保持沉默。

主要见地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1）从社会指标来看，尽管这些国家大多数获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经济表现较为均等；（2）它们取得经济业绩的原因各不相同；（3）影响经济业绩的主要因素是不良的体制（高度腐败、缺乏跨境的一体化、技术与创新的应用有限、平均教育程度与技术增进的水平低等等）、专制制度、政治上的不确定以及政府部门庞大；（4）在石油输出国，石油在带来特定机会的同时也设下了陷阱。总之，作者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过去取得了多大成就……而在于是否存在……足以用来成功地解决当前因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以提供就业机会……的经济与政治模型……。答案几乎肯定是没有。”

尽管他们的分析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很有意义，但我还是不敢与作者苟同。例如，作者故意淡化了未来的失业中妇女劳动力参与的重要性。而且，由于他们列举国家的多样性，Noland和Pack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波斯湾石油输出国的业绩非但不均等，而且在1975—2004年还低于平均水平。

疏忽带来的错误

在评价支撑均等的经济业绩的原因时，Noland和Pack没有注意到冲突和战争的作用。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埃及和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约旦都为此支付了沉重的代价，而某些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还付出了一定代价。

作者还忽略了外部势力的负作用，无论是支持独裁者的势力还是对国家实行孤立、制裁，帮助其实现精良的军事装备的“推动力量”，或者仅仅就是一项分裂和征服政策。作者说，“由于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体制具有非同寻常的长期稳定性，看来其产物（也就是专制主义）在该地区会比在其他具有相等独裁体制的地区持续存在的时间更长。”然而，他们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受到争议的问题其根本在于‘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也无能为力”。答案是，外国势力必须扛起对这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所谓的内部问题的某些指责。

“尽管根据一些社会指标这些国家大多数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它们的经济表现较为平均。”

最后，尽管作者在许多地方阐明伊斯兰不是这些国家取得经济业绩的一个因素，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确认的事也闪烁其词：“可能较早时候对伊斯兰历史遗产评议的负面阐述是正确的，但制度、政策和行为已经发生了足够的趋同，在当代世界上，其影响一直在减弱。”他们仅引用了一组时事评论员的话，而没有提供其他人相应的看法——这些人相信，伊斯兰也显然关注经济繁荣以及经济上的公正性对于穆斯林社会的重要性。

Hossein Askari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国际商务与国际事务的
伊朗教授

朋友还是敌人？

Bill Emmott

竞争对手

中国、印度与日本之间的力量抗争将如何重新构建我们未来的10年

Harcourt, 2008年, 352页, 26美元(精装)。

Bill Emmott已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主编13年。这是其20世纪80年代在该杂志驻东京记者这个职位上驻足不前之后升任的高级职位。在那段时间里，日本经济的扩张引起了美国和其他那些决定重新构建其印象中的世界的国家的担忧。但是，1989年，Emmott写了一部一反直觉的著作《太阳也会西落：日本经济实力的局限性》，预言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不可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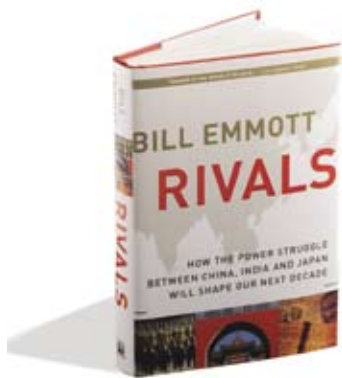
从这个一语中的的断言出发，Emmott以一种合理可信的方法着手对亚洲进行研究。2006年，他离开了《经济学家》，这使他得以重新从事报道工作，并在他的《竞争对手：中国、印度与日本之间的力量抗争将如何重新构建我们未来10年》这部著作中，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明细观察手法。《竞争对手》一书将重点放在三国的细微差别上，抨击了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喝彩，对于亚洲经济与政治的未来的讨论（这种讨论通常带有浮夸色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是一部通俗易懂的著作。

谁是正确的？

Emmott的论述是从这一洞见出发的，即亚洲前所未有地在同一时期内成为三个强势国家所在地，因而，亚洲未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三国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该书援引印度外交部一位高官的话，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这位官员说：“您所了解的事情正是我们双方（印度和中国）都在想

的事，即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同时属于正确的一方。”

由于许多中国人民指控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日本拒不悔罪，二战时期日本的所作所为在中国积下的怨恨依然是中日关系上的一道伤痕。中国依然主张对藏南达旺地区的主权——这导致了1962年



的中印之战——而印度则说它是如今属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一小片边远土地的正当主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定每年增加相应的军事支出，而印度也增加了8%（尽管该国也与美国签署了一个核能协定），这看起来都是不祥之兆。至于日本，尽管它在加强军事方面的作为受到限制，但还是在去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防务宣言——这是1952年与美国于签订和平协定之后，东京第一次涉足此类协议。

联系的纽带

更多的新闻是关于三国通过经济的融合而被交织于一体的。例如，2008年7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于高增长的势头依旧（至少中国和印度是如此），一体化还会朝着更深的层次发展，亚洲的联合将发展到自成吉思汗拓疆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这种融合将会继续下去吗？这取决于各国对能够催生经济增长的改革的推动能力。

例如，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扑朔迷离，存在着缺陷。

印度经济仍然受到制约着经济活动的、密集的监管措施的阻碍（在世界银行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排名中，该国位于较低的第134名）。该国的基础设施以及效率低下的治理体系，也威胁着投资与经济的增长。

日本经济仍然受困于四处蔓延的低效率，日经指数最近一段时间降到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在1982年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时候，Emmott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是“日本在带来失望方面令人吃惊的能力”。这条标题的说法如今依然管用。

缔造和平

Emmott以一系列处理三国间竞争关系的建议结束了本书的论述。这些建议包括建议实施一系列与安全（说服印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环境（减少污染排放和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和外交（鼓励美国支持2005年推出的东亚高级别会议，因为它是包含了中、印、日三国的惟一一个地区性实体）有关的举措。鉴于Emmott作为一名预言家在过去取得的成就，他没有说明他预期三国会作为自我毁灭性的竞争对手，还是作为互惠性的同盟国而崛起，这是一个奇怪的疏忽。

但是，对三国之间关系的正确观察离不开对中国表现的观察。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上演对树立中国形象起到了令人称奇的效果，尽管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讲话对于树立中国形象更有意义。当有人问到中国的治理之道时，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日本和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只希望这句话意味着对该地区的伙伴关系——以及和平的承诺。

Matthew Rees

Geonomica 总裁

评

关注价格

Robert J. Samuelson

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及其后果

美国过去与现在的富裕

兰登书屋，纽约，2008年，336页，26美元（精装）。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在其95年的历史中有过两次重大的失误。由于拒绝向渴求资金的全球经济注入流动资金，美联储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恶化。而在20世纪70年代，又是由于美联储没能吸收淹没了全球经济的流动资金而听任由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肆虐。在公众的感觉中，对大萧条的印象更加强烈，而对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已经淡忘了。

Robert Samuelson的这部著作对重新唤起人们对大幅度通货膨胀这段“失去的历史”的记忆作了成功的尝试。他称这段经历是后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国内政策的最大失误（一开始就强调）”。但是，本书对1960年以来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精彩描述胜过了它对战胜通货膨胀的过程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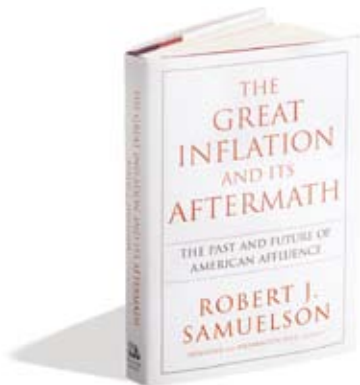
下不完的雨

1960—1979年，美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从不足1.5%上升到将近13.5%。Samuelson说，物价的上涨就像“下不完的雨”。那时，美国公民强烈抗议通货膨胀的上升。在当时的民意测验中，公众将通货膨胀描述为比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更恼人的事情”。

Samuelson指出，听任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给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带来了破坏性后果。高通货膨胀率“无可争辩地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导致越演越烈的四次衰退”。高通货膨胀——以及伴随而来的较高而波动的利率——通过压低生产率的增长，阻碍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导致股票市场陷入僵局，并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到“美国农场主、美国储蓄与贷款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这场下不完的雨是否仅仅就是遭遇了一场厄运？不是。Samuelson说，这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带来的差强人意的后果，而这些政策又是国内一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促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开始相信，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互逆关系，这意味着失业率可以通过容许存在稍高一点的通货膨胀来降低。美联储是触发大



幅度通货膨胀的“首要共犯”。Samuelson写到，所有重大的通货膨胀更多地涉及到货币，很少涉及商品，而平时美国最糟糕的通货膨胀的发生就是“由于政府通过美联储制造出了太多的货币”。

美国的早晨？

通货膨胀率是如何从1980年的两位数降到1982年的约4%的？Samuelson认为，这“主要是两个人的功劳——保罗·沃尔克和罗纳德·里根。”但是，他们为抚平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做的事却不那么漂亮。事实上，自从大萧条以来，沃尔克主席领导下的美联储已将流动性收紧得足以“给经济的下降带来最有力的惩罚”。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角色就是允许美联储长期维持

这种政策，“长得足以使通货膨胀心理预期改变”。即便到了今天，Samuelson说，美国经济不得不承受由1980—1982年间的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看上去还是骇人的”。

Samuelson认为战胜通货膨胀开创了“过去25年的繁荣”，扭转了许多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的不利因素。美国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反映在诸如微软这样的企业中的蓬勃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对美元信心的恢复等，都成为这些年份的标志。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有利于通过鼓励国内因素激发的资本的跨境流动，扭转国际金融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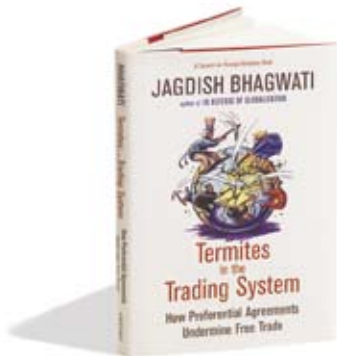
又变天了

没有哪项成功没被粉饰，也没有哪项成功会永世不衰。Samuelson承认，良好的经济业绩历经25年之后也会出现瑕疵，也许现在是成功告一段落的时候了。紧接着通货膨胀被战胜之后的那些年份是经济的增长年，但是“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社会，它已经回复到以粗略的、颠覆性状态存在的那个更受市场驱动的经济。”而持续长久的繁荣——持续的经济增长，其间只出现两次中等程度的衰退——有助于“孕育”对国际金融日益增长的复杂后果的“满足且疏忽淡漠”的情绪，及至酿成今天的混乱。

Samuelson说，金融体系与经济中其余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大而更难以预测”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最近几十年来经济何以恢复繁荣。然而，还必须汲取新的经验教训。Samuelson敏锐地指出，从战胜通货膨胀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不应该被遗忘，“大幅度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是，应将通货膨胀遏制在萌芽状态；延误的时间越长，越难以加以遏制”。

Prakash Loungani
IMF研究部顾问

激昂的声音



Jagdish Bhagwati

贸易体系中的白蚁

优惠贸易协定如何破坏了自由贸易
外国关系丛书委员会，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160页，24.95美元（精装）。

保罗·萨缪尔森这位毋庸置疑的20世纪经济学泰斗阐释了比较优势的原理：“它逻辑上的真实性在数学家面前也无可辩驳；它并非毫无价值，这一点已被千万个重要而睿智的人所证实，而在向他们做出说明之后，这些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而去领会或者相信这个原理”。然而，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尔玛对于给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冠以一个单独的命题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既真实，且重要。正如20世纪的国际经济学泰斗，《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一书的作者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的，千万个重要而睿智的人在领会自由贸易与自由贸易区（一组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下文还将精确描述）之间的原理方面却做得不太好，尽管一组简短的公理也对它们做了区分，但却没能领会它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危害。

Bhagwati一直很留意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和知识含量，以及它在长期内通过学者的文献和见诸于大众

传媒上的文章所表现出的实用性。20世纪90年代之初，当隐含在优惠性贸易协议（PTAs）趋势中的最新含义刚刚开始出现时，他是唯一一个对这种分裂贸易体系的做法提出警告的人（见他1993年发表于Jaime DeMelo和Arvind Panagariya编辑的文集《地区主义的新维度》中的文章，“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概论”，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目前，鉴于优惠性贸易协议的数量已达数百，鉴于对流入这些国家的货物和服务流量的监管的复杂性相应增加，Bhagwati的这种关注看来尤其具有预见性。

尽管成立于1948年的《关贸总协定》将成员方的非歧视性确定为主要原则，但它认可了通过第XXIV条款，允许优惠性协议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形式出现，从而使非歧视原则具有了排他性。根据通行的定义，自由贸易区（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集团）和关税同盟（例如欧盟）的成员方必须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垒，但关税同盟的成员还同意针对来自非成员方的进口制定一个共同的对外关税。尽管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希望消除成员方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但这样做并不等同于多边自由贸易。成员方向非成员方施以歧视性关税意味着可能使得进口资源来源效率低下，同时还会给成员方和非成员方带来重大的（有可能是不利的）道德规范方面的后果。尤其是，正如Jacob Viner在其1950年的一个经典性分析（发表于《关税同盟的问题》一书中，纽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证实的，成员之间在能够比世界其他地方相对有效地生产出的货物方面，可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贸易“创造”，但由于成员方之间互赠优惠，贸易也恰恰可能会从效率较高的非成员方“转移”出去，因而可能使成员方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100页充满风趣与智慧风格的书中，Bhagwati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仔细剖析了优惠性贸易协议的问题，具有历史深度并注重于政策细节。在第2章中，他分析了关贸总协定第XXIV条款的历史起源及其政治上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曾使美国政府放弃了一度所持的非歧视性原则立场，并认可了XXIV条款的排他性。他在第3章中关于实际运作中贸易转移的负面结果的论述，采用了最近的研究成果，并使针对贸易优惠的理论实例增加了有分量的实证经验。他还深入讨论了优惠性贸易给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后果，而且他确实是正确的，最近贸易体系向着相互重叠、交叉的优惠性贸易协议的混乱网络（曾被他称为“管道网”现象）的演变，可能未必是低效率的。在第4章，他呼吁各国尽量避免采取双边举措，呼吁采取基础广泛的多边自由化，以淡化贸易优惠带来的扭曲效应，呼吁我们更贴近全球自由贸易。

但是，那成千上万个重要而睿智的人们会听到吗？在过去很少的几个十年中，Bhagwati像一个传统的印度艺术鉴赏家一样，为自由贸易、为通过多边途径实现自由贸易而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同的论点。《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一书包含了Bhagwati为区分自由贸易与自由贸易区而提出的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强烈驳斥了那些使二者混淆的论点，并满怀激情地描述了这种混淆将给贸易体系带来的后果。他的这些论点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Pravin Krishna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国际经济学Chung Ju Yung杰出教授